

Switzerland Austria
In the Nineteenth
19世纪欧洲作家笔下的

拿破仑

宋德发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014034219

K835.657

63



19世纪欧洲作家笔下的

拿破仑

宋德发 著



北航

C1722578

湘潭大学出版社

K835.657

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 世纪欧洲作家笔下的拿破仑 / 宋德发著. — 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81128-561-1

I. ①1… II. ①宋… III. ①欧洲文学—文学研究—19 世纪②拿破仑, B. (1769~1821)—人物研究 IV. ①I500.64②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8393 号

责任编辑: 陈美桥

封面设计: 叶洋 孙艺哲

出版发行: 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0731-58298960

邮 编: 411105

网 址: <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8-561-1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序

张铁夫

在 19 世纪前期的欧洲，恐怕没有比“拿破仑”更响亮的名字了。拿破仑传奇的一生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也留下了永久的骂名。在文学界，它也极受人们青睐。对于文学家来说，它是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19 世纪几乎所有主要的欧洲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描绘过他，从而形成了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拿破仑主题。关于这个主题，我认为值得学者们认真研究甚至大书特书的。过去，我们偶尔读到过几篇关于某个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的文章，但对 19 世纪欧洲作家的有关描绘进行整合并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则尚未见到。宋德发博士的这部著作至少在我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点论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歌德、海涅、拜伦、雨果、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司汤达、密茨凯维奇等 11 位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同时对司各特、雪莱、华兹华斯、贝朗瑞、缪塞、大仲马、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克雷洛夫、哈代等十位作家的拿破仑书写也作了介绍。上述作家人人堪称大师，几乎个个著作等身，涉及面相当之广，阅

读量相当之大，其处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此外，上述作家的身份也相当复杂，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自然也相当复杂。褒之者有之，贬之者有之，褒贬兼之者有之，先贬后褒者有之，先褒后贬者有之。但不管怎样复杂，作者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以客观、真实、生动的文笔，将上述作家笔下的不同拿破仑形象一一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仅如此，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还始终具有一种理论的自觉，即不仅阐述欧洲作家们笔下的拿破仑形象，而且探讨了他们塑造拿破仑形象的动机和诗学意义。以普希金为例。作者认为，普希金对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差异，因此，他笔下的拿破仑形象拥有三副不同的面孔：少年时代的普希金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以一个深受拿破仑入侵之害的“俄国人”的立场来评判拿破仑。因此他在诗歌中使用了一连串的贬义词——“敌人”、“魔王”、“暴君”、“恶徒”、“噩梦”、“灾祸”、“灾星”等。这些判断未免有些偏激，甚至有民族主义之嫌，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到第二阶段，即19世纪20年代初期，普希金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即从“自由的敌人”变成了“自由的化身”。这时，拿破仑不再与俄国为敌，而亚历山大一世却处处与俄国为敌，并将诗人本人流放到南俄，这让普希金认识到真正的“暴君”就在眼前。对俄国现实和沙皇的极度失望迫使普希金寻找新的寄托和希望。他一方面竭力赞美彼得大帝的武功和美德，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拿破仑形象来宣扬自由；晚些时候，普希金对拿破仑的认识不再像过去那样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性

和现实性，而是进入了历史哲学层面的沉思。“世上奇异的过客”成为普希金笔下新的拿破仑形象。这一时期他对拿破仑形象的塑造更具有有一种超脱性，摆脱了恨和爱，有的只是一种心静如水的坦然，一种参透人世宇宙的睿智。他更倾向于从哲学、生命的角度，而非历史和国家的角度来省察拿破仑了。对拿破仑态度的变迁折射出普希金从激情到沉静、从沉静到超然物外的思想历程，揭示出他多重和多变的身份：俄国人、历史学家、诗人和哲人。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深刻的、很有说服力的分析，揭示了普希金的拿破仑主题诗歌的创作动机和诗学意义。对其他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作者所关注的也不仅是“真”与“假”、“对”与“错”，而是它所传达的诗学价值。

宋德发博士长期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起初，他在学术研究中比较注意研究范围的专一性和研究对象的前卫性，出版过有关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专著。近年来，他试图让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要做到这点，他认为应该回归古典文学、直面作品和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这部著作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我认为，它不仅对他个人的普及性教学会有所帮助，而且对同行和读者也是会有所启迪的。

是为序。

2012年1月31日

引言

也许在所有写作者的潜意识中，都企盼自己的写作能够获得读者的理解、认可甚至欣赏，我也不例外。为此，我想“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本书写作的前因后果，借此向读者交代一下拙作酝酿的过程，以及可能具有的学术意义。

2008年3月，我有幸“奉命”为童庆炳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关于历史题材创作与改编中的重大问题”尽一份绵薄之力，撰写了论文《论普希金的历史文学创作》（后刊于《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期）。在该文构思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普希金的作品涉及大量帝王形象，包括俄国的奥列格、伊凡四世、鲍里斯·戈都诺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彼得大帝等，还有一位比较特别，他就是法国的拿破仑。在这些帝王中，彼得大帝和拿破仑尤为受到普希金的厚爱，并得以在他的笔下频频亮相。为满足“好奇”之心，我又相继撰写了两篇文章：《普希金笔下的彼得大帝》（后刊于《兰州学刊》2009年第8期）和《普希金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后刊于《海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在写作后文的过程中，我零零散散地接触了一些书写拿破仑的文学作品

和少数相关的研究文献，其中有三段论述所提供的信息为本课题的构想和实践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段论述源自论文《巴尔扎克与拿破仑》：“圣波利昂指出，整个一代德国浪漫派艺术家——从歌德到瓦格纳，以及英国的拜伦、西班牙的戈雅、俄国的作家、意大利的作家、波兰的作家，甚至包括美国的爱默生都曾热烈地赞扬过拿破仑。至于法国人，作者更是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举出了那些狂热崇拜皇帝的思想家以及讴歌他的诗人、作家——从贝朗瑞到维克多·雨果。”^①

第二段论述源自论文《巴尔扎克笔下的拿破仑》：“拿破仑的业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仅有众多的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著作出现，更有多少作家、画家、音乐家从他身上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这一切，构成了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拿破仑画廊。从一七九七年二月十日在竞争剧院上演《波拿巴在意大利》开始，经过大卫、安格尔、格罗、贝多芬、柏辽兹、拜伦、海涅、司各特、托尔斯泰、雨果、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缪塞、大仲马、夏多布里昂、阿拉贡、阿努依、马尔罗（《他在《被砍倒的橡树》中与戴高乐一起讨论拿破仑问题》，直至今日，这个画廊仍在不断地延伸。”^②

第三段论述源自孟昭毅先生的《比较文学通论》。在解释

① [法] 皮埃尔·加尼纳·苏阿逊：《巴尔扎克与拿破仑》，冒怀开译，《文化译丛》1982年第1期。

② 袁树仁：《巴尔扎克笔下的拿破仑》，《法国研究》1990年第2期。

“比较文学主题学”的“英雄主题”时，孟昭毅先生以欧洲文学中的“拿破仑主题”作为案例加以说明，尽管有些论述并不完全准确——比如《意弗都国王》是讽刺拿破仑而非颂扬拿破仑的、莱蒙托夫的《七月十日》其实和拿破仑无关、《战争与和平》并非整部作品都在诋毁拿破仑等，但必须承认，下面的文字让本课题的开展少走了很多弯路：

以往许多欧洲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描写过拿破仑的形象，褒贬不一，无论他们的叙述方式、情节结构有怎样的独特性，他们还是把这一形象和自己的时代、思想、审美要求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拿破仑主题。

法国诗人贝朗瑞在《意弗都国王》、《与丽洽谈政治》、《人民纪念》、《滑铁卢之战》等诗中颂扬了拿破仑。司汤达写《拿破仑一生》、《回忆拿破仑》等传记作品，表达了对拿破仑的崇拜心情。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红与黑》、《自传记事》、《自我主义的回忆录》中，也从侧面描写了拿破仑。英国诗人拜伦在《拿破仑颂》、《拿破仑的告别》等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心情，他既称拿破仑是“盖世英雄”；也称他是“毒心汉”，因为“如果把你（拿破仑）像美名一样哀悼，那么，另一个拿破仑就会跃出，再来把这个世界凌辱”。雪莱则在《一个共和党人对波拿巴的倾覆所感到的》诗中，指出是“最邪恶的形象”欧洲封建复辟势力毁灭了拿破仑和法国革命。湖畔派代表诗人华兹华斯在《致杜桑》、柯勒律治在《拿破仑》等作品中，表达了他们反对

拿破仑，希望封建势力复辟的思想。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拿破仑传》，全书充满敌视拿破仑的基调。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在自己的《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等诗中，流露出对拿破仑的某些惋惜和同情，在另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诗中，如《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也有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莱蒙托夫在《七月十日》、《两个巨人》、《波罗金诺》、《最后的新居》等关于描写拿破仑的诗中，都流露出对这一历史巨人的惋惜之情，并勇敢地指出沙皇俄国是其“最顽强的敌人”。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作品中，美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诋毁拿破仑，表现了他早年在世界观还未发生转变时贵族保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德国诗人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观念——勒·格朗特文集》等，曾多次描写拿破仑，态度始终是同情与赞扬的，认为在德国他是革命代表，是革命的传播者。意大利的曼佐尼曾在《五月五日》的名诗中赞扬拿破仑是革命的堡垒和被奴役人民的保卫者。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在代表作《塔杜施先生》里，以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为背景，高度肯定了拿破仑在促进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进步作用。

在19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学作品中，拿破仑是个重要的主题，他就像一块试金石、一道分水岭，把当时的作家截然分成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两大阵营。也有些作家的态度是暧昧的，甚至是矛盾的。通过拿破仑主题的研究，可以从世界文学的高度重新评价一个民族作家的各种局限性，重新认识一部作品的历史真实

异学的范畴加以考察。^① 不过,总体来说,形象学的理论研究趋于平稳和平淡,取得新的突破有较大难度,目前也尚未见到此类专著。

比较而言,形象学的实践成果显得更加丰硕,经常见到的便有八卷本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周宁著,学苑出版社2004年)、《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姜智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周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与实践: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为例》(张志彪著,民族出版社2007年)、《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吕超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和《海上异托邦——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吕超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这些专著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中国文学和文化为立足点——或探寻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外国形象,或探寻外国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形象。

我们知道,比较文学是无国界的,但比较文学学者却是有国界的,因此,用世界性的眼光审视本土的话题似乎成为学者们所能采取的一种折中之策。所以说,当中国学者进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时,集中从“中/外”而不是“外/外”视野出发,既是受现实条件所限,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学术长处。但如果以

^① 可参见曹顺庆先生的《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

此为借口，完全放弃对“异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异国形象”的探索，不免也是一件憾事。为了减少遗憾，需要有部分学者尝试着去寻找一些具有“外/外”视野的课题。“19世纪欧洲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则适时地走进我的期待视野，该课题的实施对我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或许会起到拓展研究视野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的学术储备是“比较文学主题学”。我长期在高校从事“比较文学概论”的教学，在这种普及性教学过程中，“主题学”是无法绕过的一个环节。通常认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题材研究、母题研究、意象研究和人物类型研究。一般的教材认为，所谓“人物类型研究”，是指探讨“某一类型的人物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的流传演变情况”^①，然后列举这样的案例作为佐证：王昭君的形象经历了从《汉书》到《汉宫秋》（马致远），从《汉宫秋》到清末章回小说《双凤奇缘》（雪樵主人梓定），从《双凤奇缘》到《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的流传和演变；潘金莲的形象经历了从《水浒传》（施耐庵）到《金瓶梅》（兰陵笑笑生），从《金瓶梅》到五幕剧《潘金莲》（欧阳予倩），从五幕剧《潘金莲》到荒诞戏剧《潘金莲》（魏明伦）的流传与演变等。显然，这样的案例虽然具有“跨时代”性，但并不具有“跨文化”性，属于典型的“中国文学”研究，而不能称之为标准的“比较文学”研究。

众所周知，没有精彩案例支撑的理论教学是缺乏说服力和生

^① 张铁夫、季水河主编：《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命力的。为了缓解这一尴尬，我一直期待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主题学”的“人物类型研究”提供一个丰富生动的案例，从而更好地阐明同一个人物形象究竟是怎样经历“跨文化”的流传与演变的。应该说，和“王昭君形象和潘金莲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变迁”相比较，“拿破仑形象在19世纪不同欧洲作家笔下所受到的不同处理”更适合解释比较文学主题学的“人物类型研究”。

第三个方面的学术储备是欧洲古典文学。我还长期从事欧洲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这一工作也决定了我的另一个基本职责是从事欧洲文学（或曰欧洲翻译文学）的普及工作。从理论上讲，提高和普及、科研和教学不但不相互矛盾，而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事实有时并非如此。比如我讲授“欧洲文学”，从范围上说，上至古希腊罗马文学，下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从对象上说，基本以经典作家作品为主。如果为了更好地服务教学，那么我的科研应该遵循两个基本思路：一是研究的范围尽量广泛一些，二是研究的对象尽量以公认的经典为主。但这两种思路都不符合当前外国文学学术界的主流。^①

实际上，正是在“主流”的引导下，我曾在较长时间中以研究范围的专一性和研究对象的前卫性为荣，并选择美国当代作家

① 关于外国文学的科研与教学相脱节的表现、原因和缓解对策等问题，我在《大学教师的身份危机》（《理工高教研究》2008年第6期）、《高校文科教学十大关键词——以〈西方文学史〉的教学为例》（《现代大学教育》2009年第2期）、《元典教学的价值与困境》（《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2期）、《试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五大缺失》（《云梦学刊》2010年第6期）等文章中有比较具体的论述。

约翰·厄普代克作为学术自留地，通过辛勤耕耘，发表了一些论著。但必须实话实说，这样的研究可能让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者，但它对我日常的普及性教学并无明显的帮助，或者说我在科研上的付出和在日常教学上的收获并不成比例。我有些愧疚地发现，我至今还没有读完在课堂上天天要讲的莎士比亚全集、雨果文集、巴尔扎克全集、歌德文集、雪莱全集等等。读什么就不教什么，教什么就不读什么，这是我多年来所遭遇的困境。为了尽早走出这种困境，同时也能适当地适应目前的评价体制，我尝试着选择一些更直接有益于日常教学的课题来做。而这样的课题应该体现出三个特征：①回归古典文学，因为课堂上经常讲授的就是古典文学，但我们对这些古典文学，如歌德、海涅、巴尔扎克的作品，虽然“耳熟”，却谈不上“能详”。②直面作品，诚如宁宗一先生所言：“其实回归文本对于一个文学史教师来说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仅从传授已知的知识的教学工作来说，读懂文本是最起码的基本功，至于说进一步探求未知的知识的科研工作来说，第一步也必须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不然任何文学史的‘规律性’的探索，都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①也就是说，假如讲授巴尔扎克没有读完《巴尔扎克全集》，不免有些心虚，而从普及的角度上说，没有作品支撑的教学是举步维艰的。③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即可以从一定范围和层次上将欧洲文学连

① 宁宗一：《名著重读·跋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0页。

成一个整体。^①

这本小书对他人是否有所启迪，不得而知，但对我个人的普及性教学应该会起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帮助。正是在这个学术课题的敦促下，我翻阅了欧洲 19 世纪近 20 位经典作家的文集或全集，以及数以千计的相关研究专著、论文等——很愧疚，很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现在才来亡羊补牢，从而大大增加了对这些经典作家的认知广度和深度，也从“教什么”上将这个时段的欧洲文学的教学水平提升了半个档次。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可知，对“19 世纪欧洲作家笔下的拿破仑”作自觉的、带有一定系统性的研究，可能是笔者率先进行的。但并不等于说，此前没有人做过一些同类的、局部性的工作。据现有的资料可知，与本书比较相关的中文论文至少有六篇：其中虞云国的《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和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1 期）和张金鹏的《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的评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所言的“经典作家”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其实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他们“评说”拿破仑的文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因此这两篇文

① 我个人比较偏爱《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蒋承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外国文学：人学蕴含的发掘与寻思》（王诺著，科学出版社 1999 年）、《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徐葆耕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蒋承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蒋承勇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等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志趣和学术风格。

章与本书的研究思路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另外四篇文章,即皮埃尔-加尼纳·苏阿逊的《巴尔扎克与拿破仑》(冒怀开译,《文化译丛》1982年第1期)、张一东的《哈代与托尔斯泰作品中关于拿破仑与拿破仑战争描写之比较》(《绥化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袁树仁的《巴尔扎克笔下的拿破仑》(《法国研究》1990年第2期)以及任合生的《两位大师笔下的滑铁卢战役——司汤达与雨果的小说艺术手法比较分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涉及的作品极为有限,且均发表于比较文学形象理论进入国内之前,比较文学的意识并不是很明显。因此,本书“需要”,并且也“能够”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在广度乃至深度上更进一步。

所谓深度,是指本书托“比较文学形象学”之福,在具体写作中融合了一些理论上的自觉,尤其对作家们塑造拿破仑形象的动机和诗学意义有所辨析。所谓广度,是指本书论及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波兰、美国的近20位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华兹华斯、雪莱、拜伦、哈代、歌德、海涅、雨果、夏多布里昂、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密茨凯维奇、爱默生等所书写的拿破仑。当然,由于“法国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没有具备“跨文化”的特质,因此并不属于狭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探讨一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异国形象。但由于其基本研究路径和比较文学形象学并无本质差别,所以完全可以将之纳入广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

学范畴。^①更因为此类研究能够为非法国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提供有力的参照，故也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最后想对本书的结构作一个说明。本书既没有设计一种比较严密的递进式结构，也没有采用那种没有结构的散文体结构，而是将两个结构方式进行调和，采用比较传统和保守的平行结构，即一位作家以一章的篇幅进行论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独立成章的作家均归入最后一章“其他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这种结构方式避免了递进式结构的刻意性，也避免了散文体结构的随意性，既能将最基本的问题说清楚，也保证了思维的清晰性。同时大部分章节还内含着这样的逻辑和层次——这位作家笔下的拿破仑形象是什么？这位作家为什么这样塑造拿破仑形象？探求“是什么”和“为什么”对认识这位作家思想或艺术上的独特性有何帮助？

① 部分学者提出了“泛比较文学”的理念，主张不要对比较文学做过于严苛的限定，颇有道理。可参见何云波先生的论文《比较文学：越界与融通——兼评马焯荣先生的“泛比较文学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马焯荣先生的论文《泛比较文学与坐标比较法》（《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1期）等。